

评法家著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评 法 家 著 作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评法家著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齐齐哈尔第一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2/18·字数80,000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0

统一书号：3093·114

定价：0.24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目 录

《商君书》中的《更法》	李忠钧 (1)
变法的号角 论战的记录	
——读《商君书·更法》篇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理论学习小组	(4)
灭害虫 除儒“奸”	
——读《商君书·农战》	
.....四六八八部队某部战士理论小组	(16)
摧毁旧制度的基础	
——读《商君书·垦令》	周 泗 (19)
“制天命”的理论是对儒家“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读荀况的《天论》	
.....王书美 朱耐畴 彭子才	(22)
荀况的《王制》	傅哲兵 (30)
荀况的《王制》选注	(33)
韩非的《五蠹》	李昌华 (38)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理论根据	
——读韩非的《五蠹》	
.....《文汇报》第七期工农兵理论学习班	(41)
反对分裂割据坚持中央集权的理论	
——读韩非的《孤愤》	
.....上海师大政教系大批判组	(53)

《韩非子·显学》篇……北京师范学院 师 钟 (59)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两条任人路线的斗争

——兼论李斯《谏逐客书》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 (64)

晁错的《贤良对策》……柴玉英 (76)

王充的《论衡·问孔》篇

……北京师范学院 师 钟 (79)

王充的《论衡·刺孟》篇

……北京师范学院 师 钟 (83)

王充的《实知》和《知实》

……北京师范学院 师 钟 (87)

尊法反儒的战斗檄文

——谈曹操的四个《令》

……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

工人文艺评论组 正文 (91)

谈曹操的诗《龟虽寿》

……北京东方红医疗器械厂工人 何大章 (97)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庆余 (101)

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北京师范学院 工农兵学员 (103)

敢于蔑视孔孟之道的战斗篇章

——读李贽的《焚书·答耿中丞》

.....天津橡胶工业公司工人理论研究小组 (107)

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读王夫之《秦始皇》

.....天津第二炼钢厂工人理论小组 (110)

试谈历史上关于秦始皇的两派论争

——从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谈起

.....梁 效 (115)

《商君书》中的《更法》

李志钧

公元前三五九年，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场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倡导者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由于这次变法的矛头所向，直接触犯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当变法的序幕刚一拉开，就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种种阻挠和破坏。为了使变法顺利进行，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对自己的主张，坚定不移，对旧势力的阻挠，奋力反击，最终取得了变法的成功。《商君书》中的《更法》篇，正是以商鞅的变法活动为题材的一篇好作品。

这篇作品，全文总计仅六百字左右，然而却写得形象生动，言简意明。它以具有独特风格的对话形式，再现了变法前夕商鞅舌战儒家，为变法大造舆论的动人场面；记述了商鞅反对“法古”、“循礼”的法家思想，以及他的进步社会历史观。

全文以洗炼的叙述法起笔，首先向人们交代了论战的人物、背景：秦孝公正在评议、计划国家大事，侍候在旁的有商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随即秦孝公提出了论战的焦点：要不要“变法”“更礼”。

究竟要不要“变法”“更礼”？这正是摆在新兴地主阶

级面前急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社会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各诸侯国中，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已先后出现。尤其是秦国，从秦简公实行“初税亩”算起，到当时已历经了近五十年。如何进一步变革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封建制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守旧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商鞅坚定地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当着秦孝公的面，提出了必须坚决“变法”“更礼”的主张。他认为，只要能够强化地主阶级政权，就不必沿袭旧法；只要有利于地主阶级，就不必因循旧礼。（“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商鞅的主张，赢得了秦孝公的赞同，然而当即遭到儒家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之流的强烈反对。甘龙、杜挚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是满口儒家说教的守旧派。当秦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时，甘龙首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大嚷什么：“知者不变法而治”，“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还以恐吓的口吻对秦孝公说：你如果要“变法”“更礼”，不依秦国老规矩办事的话，就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应该好好想想后果，妄图动摇秦孝公变法的决心。面对甘龙的挑衅，商鞅毫不让步，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严厉地批驳了甘龙的谬论，把甘龙杜撰的儒家说教称之为“世俗之言”，斥责了这些士儒，说他们不过是些“拘礼”“制法”（为礼所拘囿，为旧法所限制）的“愚者”、“不肖者”，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国家大事。

甘龙的谬论刚被驳倒，杜挚又相地跳了出来。他的言语

更加露骨，公然叫嚣“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杜挚的思想，显然是孔老二“克己复礼”主张在新环境下的再现，目的则是妄图按儒家的路线来改造秦国。面对儒者的再度挑战，商鞅依然如故，据理力争。他用进步的社会历史观，痛斥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儒家信条。指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不同了，政治措施理应改变，这是无可非议的。“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决无万古不变的制度，进一步阐发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进步观点，抨击了儒家因循守旧思想的荒唐性，证实了“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等法家思想的正确性，反映了商鞅坚持变法，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斗争精神。经过这场激烈的论战，商鞅最终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从思想上打退了守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为变法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论战也给了秦孝公很大鼓舞，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变法的信心和决心，终于亲手颁发了商鞅制订的第一道法令——《垦草令》。

《更法》的煞尾，仅用“于是遂出垦草令”七个字作了收笔。然而却颇耐人寻味：它不仅向人们交代了这场变法前夕的舆论准备，而且鲜明地展示了这场儒法斗争的可喜成果。

（原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变法的号角 论战的记录

——读《商君书·更法》篇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理论学习小组

《商君书·更法》篇，是战国中期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在秦孝公主持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上，同奴隶主贵族代表、反动儒生进行大辩论的生动记录。它叙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坚持变法革新，敢于冲破奴隶主贵族反动守旧、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种种阻力的斗争经过，反映了商鞅这位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的革新进取精神，提出了处在十字路口的秦国，要不要实行变法，要不要实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这个重要问题，解决了秦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商鞅变法的时代，是新兴的封建制取代没落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反动奴隶主贵族的王冠一顶顶落地，分封割据的诸侯国一个个垮台。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新兴地主阶级作为当时新生产关系的代表，登上了政治舞台，纷纷起来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失去国家政权的奴隶主贵族总是千方百计纠合复辟势力，妄图“兴灭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异常尖锐的。当时的秦国，在秦献公武装夺取了政权的基础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是秦献公没有完成改革就死

去了，一些奴隶主贵族则乘机图谋反攻倒算，力图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秦孝公即位后，是沿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回去？这个问题成了当时秦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商鞅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来到了秦国，经过三年的说服工作，在秦孝公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革，运用“法治”扫除奴隶制残余，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路线正确，后来居上，从而使秦国一跃而为当时强盛的封建制国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实行变法，还是反对变法？这是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的一场阶级斗争，也是儒法两家为推行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而展开的前哨战。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之徒，鼓吹“法古”、“循礼”；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商鞅，主张“反古”、“易礼”。他的有关论述——

治世不一道（一，同一；道，办法，措施），便（方便，有利）国不必法（效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修古（不遵循古法）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变更）礼而亡。

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未必见得）多是也。

知（智，有见识）者作法（创制法令），而愚者制（拘泥于成规）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没有出息的人）拘焉。

“法古”、“循礼”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是一路货色，都是维护和复辟没落奴隶制的反动理论。一切行将灭亡

的反动派总是要拿起这个破烂的武器，这决不是偶然的。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到春秋末期，奴隶制日益崩溃，奴隶主阶级没落腐朽，反映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就是孔学的出笼。这种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一产生，就作为维护和复辟旧制度、旧秩序的宣传工具。其思想核心是“复古”、“复礼”，就是倒退复辟。“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当时秦国的大夫甘龙、杜挚，就是没落奴隶制的政治代表。他们反对商鞅的变法主张，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因而也只能求助于孔孟之道，学着申公豹，死死朝后看，盯着“古”和“礼”，编造了古代圣人都是“不变法而治”的谎言，提出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易器”的反动谬论。很明显，甘龙、杜挚之流所谓的“功”和“利”，就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就是要维护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上的“井田制”、政治上的“分封制”、思想上的“天命”统治。为此目的，他们总是把仅剩的一点复辟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捞到一根烂稻草就象是抓到了救命圈一样。什么“十倍”、“百倍”全是骗人的一套，无非是反对变法，实行复辟。但是，他们这一套复辟经那里挡得住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暴风雨。商鞅在斗争中列举事实，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反动儒臣的复古、倒退论调，提出了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对国家方便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的主张，明确指出一切“法古”、“循礼”的反动论调都不应给予肯定，只有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推动社会前进，才能维护新兴地主阶

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商鞅坚定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代表进步阶级的有见识的人，敢于创新，坚持“更法”、“易礼”，因而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他们死抱住旧制度不放，反对变革，咒骂历史车轮开得太快，只能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商鞅踢开了绊脚石，以要“变”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的“不变”，取得了两种不同理论、不同路线斗争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切反动顽固派的基本思想特征，就是妄图把历史车轮向后拉，开倒车。孔老二和甘龙、杜挚是这样，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也是这样。林彪颂古非今，拚命“复礼”、又大肆吹捧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鼓吹“不变”，是为了顽固地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是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但是一切妄想“复礼”变天的家伙，他们的前途都是很不美妙的。孔老二、林彪都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们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我们主张“变”，就是要革命，要前进。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决没有什么永远静止、凝固不变的东西。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它充满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才能发展。我们国家刚解放的时候，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但是穷则思变，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现在已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

盾，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实践证明：斗则进，不斗则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三、历史的发展是一代比一代进步，还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儒法两家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商鞅从社会变革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时代是前进的，必须“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进步主张。他的有关论述——

前世不同教（对民众的教化），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古代民族名称）教而不诛（指刑罚），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指残暴的意思），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兵器配备）各便其用。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人类社会从“远古”、“中世”到“当时”，总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进步阶级取代没落阶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看到了历史进化的规律，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历史上一代更换一代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古代，一切仿照陈旧的一套是毫无道理的。他充分肯定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坚信新兴地主阶级要胜过没落奴隶主阶级，主张要按照时势来建立法制，按照实际情况来确定政策措施，以顺应历史潮流，建立新的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一切没落阶级都是历史的盲人。在他们看来，一切腐朽的东西都是尽善尽美的，只许全盘继承，不准有丝毫改变，

他们总是把光明和黑暗弄颠倒。在理论上，他们拚命鼓吹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维持旧质的稳定性，把旧事物看作是神圣的、永恒的。在政治上，他们要维护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革新，反对革命。这种十足的“腐儒”古往今来，不乏其人。复礼狂孔老二，开口“祖述尧舜”闭口“宪章文武”，把“周礼”看作是万古不变的信条，妄图让奴隶制永世长存。复辟狂林彪，也一再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大肆宣扬“今不如昔”的谬论，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政治上“危机四伏”，经济上“停滞不前”，生活上“缺吃少穿”，恶毒攻击和咒骂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想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之，在他们一伙看来，简直是“一代不如一代”，只有依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年代里去，他们才会感到称心。

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我们工人群众在万恶的旧社会吃过的苦头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劳动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的国家成为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瓜分的一块肥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革命改变着祖国的面貌，社会主义的山河一天比一天美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荡涤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我们工人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主人，而且是理论建设的主力军。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抹杀不了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三、坚持新兴地主阶级的“法”，还是实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礼”？这是秦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也是儒法两家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商鞅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强国”、“利民”，必须实行“法治”，即实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他的有关论述——

三代（指夏、商、周）不同礼而王、五霸（指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不同法而霸。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如果）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旧制）；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新兴地主阶级用革命暴力打垮了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这个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还得用鲜血来保卫。

处在十字路口的秦国，就面临着如何保卫和发展这个胜利成果的问题。秦孝公主持的这次重要政治会议，正是为了考虑时势的发展变化，讨论国家政治法律的基本原则，研究如何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这个重大问题。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同儒家的斗争中，总结了“三代”、